

圆觉经变像浅析

赵晨汐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摘要】佛教造像是时代特征、工匠技艺、民众信仰、在地文化的艺术产物,《圆觉经》作为汉地佛教的重要经典,在西南地区广泛传播,其“分同华严”的特性属于“中国化”的范畴,所以对于圆觉经变像进行探究不失为一种剖析佛教中国化的一种方式。本文通过对川渝地区圆觉经变像、主要在于大足宝顶圆觉洞石窟进行研究,从“造像依据”这一视角出发,结合时代背景、人文特点、信仰特征等方面,分析圆觉经变像可被凿刻出的原因,进而阐释圆觉经变像中的佛教中国化意趣。

【关键词】《圆觉经》;圆觉经变像;中国化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2021年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汉地佛教菩萨造像中国化探析(编号SZKY2021061)》课题研究成果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figure of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Chenxi Zhao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Buddhist statues are the artistic product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raftsmanship, people's beliefs and local culture. The figure of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Sutra, as an important classic of Chinese Buddhism, is widely spread in Southwest China. Its characteristics of "sharing the same Huayan"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Sinicization". Therefore, exploring this fig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way to analyze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This figure is mainly lies in the Yuanjue cave Grottoes in Dazu Baoding mountain and this paper is going to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this figure can be carved there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basis". Combing with the era background,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belief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explains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in the figure of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Keywords】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The figure of 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Sinicization.

引言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广博而庞杂的问题,是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进行融合、取缔、双向选择的过程,形成有别与印度传统佛教的中国佛教。方立天先生认为“佛教中国化包含佛教思想、信仰、修持方式、礼仪仪轨、信徒宗教生活等方面。”而台湾学者李志夫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比作河流流入河床^[1],“印度佛教之水流入中国文化之河床,受到中国文化的冲击,形成大小之漩涡。”他认为印度佛教文化受到中国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形成大漩涡,受到文学及艺术的冲击为小漩涡。这在方先生的基

础上提出,佛教中国化不仅在信仰、义理、仪轨上有所发展,还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冲击。虽在定义上有所补充,但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关于佛教造像的文章,检索结果中多次被引用的文章大多都是以考古、文物以及艺术的角度去对佛教造像进行探析,鲜有通过造像表象的本身对深层次的佛教中国化变迁特征进行研究。但佛教造像不仅是教义图像化、世俗化的主要标志,也是时代特征、意识形态、具象化思维,艺术审美的综合体现,所造之像不仅是时代的缩影,更是宗教要素变迁的活化石,所以能通过通过佛造像本身,深入的对造像的时代背景,中国化痕迹进行讨论是有必要的。

1 佛教造像

佛教造像艺术和佛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两者却不可分割，他们之间的联系在于以经、律、论为主要教义传播方式的佛教实质上同样以一种形象化的存在形态进行传播即：建筑、壁画、雕塑等等。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也带领了佛像本身进入中国，具象化的佛像能够让人们更好的理解宗教本身。我们深挖佛教造像历史，释迦牟尼生前反对佛像制造，《增一阿含经》中提到“佛不可摸测，不可言长言短”，为佛造像在当时是作为戒律被禁止的。“如来身者不可造作”。所以释迦牟尼涅槃后，宗教团体中的佛陀象征物往往是寄托在如佛足印，菩提树这一类释迦牟尼生前留下过痕迹的物品。但造像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在婆罗门教时期就已经有宗教的雏形，古代印度工匠并没有将技艺局限于宗教传统之中。随着宗教的不断发展，佛教文献中也有了自身的度量文献经典即：《造像量度经》，而佛教度量的文献中，参考价值最高的是《舍利弗》，也称之为《身量》。这些经典是佛教造像的起源，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佛像传入中国后不断变迁的重要原始资料。在高田修《佛像的诞生》一书中“佛像在发展伊始，主要是围绕着佛陀本身的故事展开的，多以佛传图的形式出现，并没有单独佛陀的形象。”这也从侧面能看出主体佛陀的形象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的扩大，直至作为单独的崇拜对象。佛教是以实践为主要修行方式的“无神论”宗教，而佛教故事中的集体义理，修行方式，普度众生的隐藏思想不断被达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佛陀本身所浓缩和替代，这也是宗教思想变迁的一个重要体现。

佛教造像的形成标志着佛教的大众化，集体观像的需求不断增大，巴蜀地区的佛教造像相比龙门、云冈石窟，更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巴蜀造像丰富庞杂，数量居多，东汉时期的乐山石刻造像，以及万佛寺的南北朝石雕，均可以证实四川佛教造像的兴盛时期并在全国享有盛誉。从《通志略》中所提到的“梁普通二年（521年），招提寺古刹下铭”在四川安岳县，佛教造像于魏晋时期就已经盛行。

2 圆觉经变像

2.1 圆觉经变像梗概

圆觉经变像的造像的主要依据源自于经书《圆

觉经》。《圆觉经》全称为《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沙门佛陀多罗。唐云觉救。北印度罽宾人也。于东都白马寺译圆觉了义经一部。”根据《开元释教录》所言^[2]，此经为佛陀多罗所译，并由多位高僧作疏，特别是受到圭峰法师宗密的推崇继而广传。《圆觉经》运用因明学的三支论式，以十二位菩萨与佛陀问答的形式，展开对于圆觉大义之探索。全文共十二个章节，每一个章节记述一位菩萨的询问和佛陀的回答。十二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文殊、普贤、普眼、金刚藏四位菩萨的问答构成；询问大乘理趣相关内容。第二部分由弥勒、清静慧、威德自在菩萨、辨音菩萨的问答构成；询问的是与修行禅法相关的问题。第三部分有净诸业菩萨、普觉、圆觉、贤善首菩萨的问答构成；询问的禅病与禅机相关的问题。十二章，三个部分，章与章之间相互铺垫补充，每一章的问答都非常明确，直击圆觉顿渐之教义，贯彻华严经之精髓。

圆觉经变像在川渝地区的分布集中在大足与安岳两个地区，造像时期均集中在宋朝。在安岳地区的圆觉造像坐落于云居山的圆觉洞景区内，安岳云居山摩崖造像，为黎令宾于唐代开元年间开山建造^[3]，据《安岳县志》中所提到的北周时期有佛窟造像龕及明代《重妆功德记》中提到的：“夫古洞华严，乃周昭遗迹”。可以得知，安岳县的造像从南北朝开始，经过隋朝、唐朝，最终在北宋的时期达到鼎盛，技艺达到巅峰。其中，圆觉洞为北宋时期造像，但笔者前往圆觉洞实地踏勘时，发现圆觉洞造像因受风化等原因已不可考。

与安岳石窟现存多为盛唐作品不同，大足石刻具有“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几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的特点，因而分布更加庞杂、雕刻典籍内容更加完全。就年代而言，大足地区的石窟开凿于晚唐时期，比安岳地区造像稍晚，其中包括晚唐、五代以及两宋时期的作品。自石窟艺术于古印度传入汉地，经历盛唐前两次在北方的造像丰碑阶段，于后期至宋末引领了中国石窟建筑的最后的高峰。大足石刻包含大足县城内多处摩崖造像，而圆觉经变造像在大足宝顶石刻群中，以大佛湾为中心的大足石刻中，南段多开凿于两宋时期，北段多为晚唐及五代时期作品，“开凿的题材中约三分之二为密宗造像。”根据《大足县志》所提供的资料^[4]，宝顶

山石刻由赵智凤开创，“赵智凤学柳本尊密法3年，淳熙六年（1179）返县，择宝顶山设坛，‘传柳本尊法旨，立柳本尊教派’”他将宝顶山营造为弘大的密教金刚部道场，结合当时时代特征，在南宋推行“忠君爱国重孝”等治国理念时，审时度势，融合儒家孝行，赢得各路官员赞赏参拜，大足宝顶石刻作为宣扬教化佛教的同时，也做到教化民众“忠君爱国”“孝行天下”等特征。这使得宝顶山成为巴蜀密教中心，大足石刻因其饱含的多种文化意蕴成为国之石刻丰碑。由于大足石刻相比安岳石刻更具文化意蕴且保存更为完好，本文将集中探讨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石刻群中的圆觉经变造像。

2.2 造像依据讨论

圆觉造像可以在川渝大足石刻以及安岳石刻被凿刻并得到广泛推崇的原因是值得讨论的，原因在于川渝地区特别是大足地区为密宗盛行区域，虽佛教宗派共存，但凿刻“圆觉洞”的大足宝顶山石刻为巴蜀密教中心，为赵智凤营造的密教金刚部道场，为何作为“分同华严”的圆觉经典能够在此凿刻并文明古今，探析其造像依据不失为解答此问题的好视角，并且我们能通过其依据中窥探佛教造像视域下的佛教中国化身影，处于宋末的造像背后，结合着文化、技艺、地区等多种因素，才有如今耀于全球的大足石刻群。

（1）《圆觉经》文本的盛行

从造像本身出发，我们首先能想到的是其依据于经书《圆觉经》，作为其经变像，这是最直观的依据。根据潼川沙门释居简在《圆觉经集注》的序言中提到“圭峰发明此经……于广博浩繁之中略为别本，由唐至今，广略并行，西南学徒家有其书，于戏盛哉”由此可见，当时《圆觉经》在西南之地十分盛行。为何此经书能如此盛行，原因在于此经书其行文内容趋于“调和”，契合时代思潮。《圆觉经》的内容，符合时代所需的“调和”之用，其中“一切众生，种种幻化虚妄，……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与禅宗思想趋于一致，而“一切众生，……皆生如来生圆觉妙心^[5]。”符合华严宗“圆融”的思想，由此可见，《圆觉经》内容分涉多宗，适应宋代所需现实需求以及思想潮流。自盛唐之后，佛教因唐武宗灭佛及战乱，各宗派摇摇欲坠，进入宋代时期，佛教受到各方排佛思潮的挤压，各宗派只

能加强儒释道三教合一且宗派之间从对立变为融合才能在时代中站稳脚跟。宋朝统治者以禅法为《圆觉经》注疏^[6]，受到统治者的支持推崇，宋代士大夫层面也将《瓦楞经》与《圆觉经》作为其参禅学佛的经典。

而此经书盛行的原因其二在于：《圆觉经》受到圭峰宗密禅师的极力推崇。宗密禅师出生于四川西充县，为华严五祖，本从科举之路，于元和二年偶遇道圆禅师行具足戒出家为僧，后南下从华严四祖澄观，兼涉禅、华严二宗学说，他在此期间接触到《圆觉经》，“幸于涪上，……教逢斯典。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轴之中，义天朗耀。”“圭峰禅师，遇圆觉了义，卷未终轴，感悟流涕。”受到很大非常大的启发，自此开始潜心钻研《圆觉经》，他认为“圆觉”是贯通包含禅宗和华严宗的最高概念，不仅可以融汇禅宗各家，使得内部各家顿渐次第修行法门得以贯通，还能够以即体即用和本觉圆觉的模式去融汇佛教各宗思想和修行方式，实现统一各家之说的抱负。宗密禅师在钻研此经的过程中，产出众多成果，从《圆觉经略疏》的序言我们可以得知，宗密“乃为之疏解。凡大疏三卷。大钞十三卷。略疏两卷。小钞六卷。道场修证仪一十八卷。”这些成果在唐代禅教合一的背景下，融合顺应三教合一的局面，消弭混乱时期佛教界的思想交锋局面，得以使《圆觉经》广泛传播，甚至广泛传播与日本与朝鲜地区，以致于到宋朝时期，他以《圆觉经》为基石而发展出的深渊思想，成为佛教宏阐的发展风向，《圆觉经》也毋庸置疑的成为入宋后的佛学经典之一。而宗密禅师在川渝地区享有盛誉，“唐圭峰禅师说法于此，有二龙听讲。”^[7]不仅受到当地民众爱戴，还有被神化的可能性，所以由宗密禅师所推崇的圆觉经典在四川地区广泛流传。

川渝地区民众对于菩萨信仰有极高的认可度。四川名山峨眉山作为四大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道场，自东晋伊始，就为僧人建殿供奉普贤之像，“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现有菩萨，名曰贤圣，常在其中说法。”普贤菩萨信仰在四川地区因名山坐镇而一直受到佛教徒的崇拜。不仅如此，在川渝地区的大量石窟中，文殊菩萨造像也不在少数，在大足、安岳、资中都有大量的文殊菩萨造像。由此可见，菩萨信仰在川渝地区影响很深，依《圆觉经》

而建的洞窟多位菩萨造像，与当地的信仰类型有联系。

(2) 大足石刻凿刻需求

如前所述，川渝地区民众的信仰特征具有包容性，宝顶山大佛湾的第24号洞窟为道祖、山君龕，26号为鲁班仓，这说明并未严格按照密宗经典凿刻造像，而是挑选当时能为教化所用且适应山形的经典凿刻成像，所以大足石刻的密宗道场出现圆觉经变像也属于其中原因之一。大足石刻总共有31龕石刻被凿刻于宝顶山大佛湾区，圆觉洞处于第29号洞窟，位置偏后，体现其重要地位的同时，也与大宝顶大佛湾观像顺序及内在逻辑有关系，这样的安排更具教化意义。圆觉造像所处位置前有27号柳本尊正觉像，柳本尊苦修之精神代表了修行者修得佛法的决心，紧接为29号洞窟：圆觉洞，此洞窟营造置身无上圆觉之地得问法过程，修行者进入习得修行法门，最后为30号洞窟牧牛图，比喻修行者调伏心意得禅修过程。由此造像逻辑进行梳理，圆觉洞凿刻在此是具有教化意义上的布局安排，而圆觉经典所具备的故事性、画面感、引显入密等特征都符合当时设计者的初心。综上所述，华严经典《圆觉经》的造像会出现在密宗道场的原因在于：造像背后所引申出的教化意义及川渝民众信仰特征中的包容性。

综上所述，不论是经典的流行程度，或是川渝地区信仰群众的自身特点，加之此地的政治环境，都使得圆觉经变像得以在密宗道场得以凿刻并闻名世界，这有别于印度本土的造像特征，有别于中原地区的造像风格与成像内容，具有很深的在地化色

彩。

参考文献

- [1] 方立天.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全2册[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 [2] 佚名. 《开元释教录》[J]. 佛学研究, 2018(1):275-275.
- [3] 吴钢. 全唐文补遗 第7辑[M]. 三秦出版社, 2000.
- [4] 丁明夷. 四川石窟杂识[J]. 文物, 1988(8):13.
- [5] 王红岩. 《圆觉经》研究[D].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11.
- [6] 龚隽. 唐宋《圆觉经》疏之研究:以华严,天台为中心[J]. 中国哲学史, 2011(2):14.
- [7] 常明, 杨芳灿等纂修. 四川通志 第1册[M]. 巴蜀书社, 1984.

收稿日期: 2022年3月9日

出刊日期: 2022年6月14日

引用本文: 赵晨汐, 圆觉经变像浅析[J]. 科学发展研究, 2022, 2(1):18-21
DOI: 10.12208/j.sdr.20220005

检索信息: 中国知网 (CNKI Scholar)、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 ©2022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